

第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与学校德育的时代创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一个东方巨人开始站起来了。这是一个有古老历史和伟大民族的国家。它国土广阔，人口占世界1/4，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曾经历五千年风雨砥砺仍可以泱泱之风傲展于世的国家。19世纪的拿破仑和马克思都把它比喻为沉睡的东方巨人。拿破仑在160多年前就说：“中国，那是一个正在酣睡的巨人，别惊醒它！因为它一醒来就会震动世界。”这一沉睡的东方巨人，经过从鸦片战争的轰隆炮火以来的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和劫难，终于开始苏醒，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伟大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宣告了一个巨人的伟大时代的诞生，预示着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本书正是探讨这个民族走向伟大时代过程中，学校德育的嬗变和再生这一历史转折，即以何种方式实现其历史传承和时代变迁，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世界社会历史发展表明，学校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时代变革的要求，是衡量历史发展的重要标杆。自大工业生产出现以来，人类社会的一切变革，都必然要引起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相应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必然要进入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生命机制的现代学校系统。因为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不断

发展，学校日益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骨干人才的任务。现代社会变革，科技进步尤其是道德的演进，更是要借助学校的作用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通过改革学校德育来培养新一代的特定的品质从而实现社会变革的要求。然而，学校的德育变革又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影响，这就致使学校德育变革往往在社会变革之后，是教育改革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部分。因此，学校德育是现代社会的晴雨表。研究新中国学校德育的历史演进，能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力地展示这一伟大时代的进程和历史转拆的具体形式。同样，当我们把历史焦点放在学校德育的进程上，着力阐明其运动的规律及其基本形式，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发展，找到促进民族振兴的重要支点。

一、中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变革历程

中国是一个封建制沿袭两千多年的社会，自汉代大倡独尊儒术以来，历经唐宋各代的发展，形成了以孔孟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德育体系，并影响东南亚诸国家而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儒学在明清之后日渐僵化，尽管所倡导的爱国、社会责任心、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勤俭进取等思想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可贵精神，但是作为整体的儒学本身已表现出严重的历史惰性，它所主张的两个核心思想，即“三纲五常”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封建等级观和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对立割裂的利义观，集中反映了儒学的空疏陈腐性，以及在学校中推行“内圣外王”、修身克己、恭顺谦卑人格修养和注重背记传统古训的模式，仅仅注重对旧制度旧伦理的复制功能，严重地压抑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泯灭了这一大国的创造力，是导致中国封建王朝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的炮火使民族面临生存的严重危机，人们开始了清理国粹、倡

导新社会价值、匡扶社稷的运动。废除科举、废除尊孔读经成了中国学校德育现代变革第一阶段的首要任务。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大力倡导新道德，揭示旧儒学等的吃人害己的本性，主张革除陈旧腐朽之礼教。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民族危机空前，进一步激化了封建制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反清起义、义和团运动和本世纪初兴起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学校德育现代变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其特征和任务是颁布世俗学制，废除尊孔读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倡导科学与民主、创立新文化、新道德的伟大运动。这一运动动员了广大国民参与，各种学生运动和工人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空前高涨。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陶行知等人都站在斗争前列，积极推动这一变革。经过 50 年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学校德育现代变革的第三阶段，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巨变，而且提供了创立新学校德育的重要社会基础。如果说前两个 50 年是在旧制度下推行德育变革的话，那么探讨在民主社会体制下学校德育现代化的另一个 50 年，将使我们更清晰地洞察德育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旧体系走向新模式的最佳轨迹，从中发现创建现代中华学校德育的最重要启示。

二、建国的革命性断代与中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根本的区别，它是一种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本质转变，是中国从封建制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从剥削社会制度转向民主社会制度的历史质变。因此，建国本身就是一种代表新社会历史进程的革命性断代。这种革命性断代比起以往的历史断代来说，是量变与质变，渐变与突变的区别。汉代以来历代朝代的更迭自不待言，即使是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包括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也是封建社会间的渐变过程，其间的某些质变也是部分的或很小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是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给中国带来一次巨变，但孙中山先生所要建立的政权在本质上也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相对来说，也没有像建国这样以彻底革命的方式，一次性地实行革命政权的交替。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一次历史发展的重大创新，它以崭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了历史转折的新纪元。它宣告中国人民不仅告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也将摆脱剥削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 28 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根据中国实际对社会发展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建国这一革命性断代对中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

(1) 首先，建国是一次重大的文明替代和更新。而在这个文明替代更新中，道德伦理的替代与更新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需要国民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向旧伦理道德观念做出决裂和告别，而且要求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创建出新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建立崭新的现代学校道德教育体制。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多次改革的不成功，其间有许多因素，但至少与道德伦理的更新有重要联系。洋务运动倡导“正人心、移民俗、新民德、精爱立”，“为本中之本”（《复许竹笈书》）但失败于“中学为体”。戊戌变法强调“德”，严复提出政风、民风、学风，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895年）但失败于“托古改制”之弊。所以陈独秀在 1916 年 2 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中国的进步必赖国人之不断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922 年 4 月，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国人在革命的失败中逐渐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便很深刻地强

调道德观念的更新。而反观每一次社会进步，都必然要在触动道德伦理的变革之后才真正发生。无论是陈独秀认为每次革命都应成为促进国人觉悟一次，还是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的解放思想，批孔反封建运动使中国“总算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等等，都深刻地指出历史转折和文明替代中道德更新的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倡导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它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校德育体系。

(2) 建国的跳跃式革命性断代，将产生激烈的道德失落和价值冲突，造成学校德育变革进程的艰难曲折。我们知道，西方现代化的变革是根植于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之上的制度创新，基本动力来自社会本身内部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它们走的是一条渐进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启动的，这种压力促使我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示范，依靠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用革命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过程。建国本身就是以革命手段加速社会进化的成果，这一制度的建立无疑对中国的社会演进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中国是一个沿袭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国家，其社会道德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与现代化之间有本质的对立。跳跃式的社会进化简化甚至取消了道德与经济社会长期演进过程中相互适应协调的过程。结果一方面德育在其本质上具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性，不会立即依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创立而更易，同时，跳跃式的发展又取消了进化过程中德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协调过程，而另一方面，建国的新社会体制提出建设新德育的高水平目标，这就造成了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导致学校德育的现代变革进程中充满着艰难险阻，要克服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预示着创建新中国学校德育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

(3) 创建新中国学校德育是一项对传统的继承和新文化的吸纳创新的过程。从建国这一历史转折看，创建新中国学校德育，必

然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至少要大力推进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传统德育的批判和继承。道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定物，具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和传承性。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①列宁谈到创建无产阶级文化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②毛泽东在建国前 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就提出学习革命理论与历史遗产对了解实际运动有紧密的联系，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③这些思想也完全适用于创建新德育的工作，特别是指出要继承传统德育有用的东西，总结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是十分有益的。二是要推进历史遗产的蜕变，即继承本身不是照抄而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它必须通过对旧德育的批判选择，扬优弃劣过程来达到继承的目的。这种继承过程在本质上要使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和传统德育成为实现自身适应建国的历史转折的一个历史性蜕变过程。这种蜕变表现为传统道德伦理精神和旧学校德育的削弱解体，又表现为新时代道德伦理精神的建构和新生。所以，继承不是直接原本不动的照搬，批判也并非打倒在地，弃之不用。继承是一种发展上的继承，批判也是以对传统的继承为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4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9 页。

的批判，它是传统与未来在对接中撞击所闪现的思想火光，对传统的继承和批判是取决于传统道德处于现在与未来视野中的分量来决定的。新中国开启的是新时代的学校德育，它决定了必须有批判的形式才能实现这两种异质德育的历史传承。三是要大量吸收国外先进的德育经验，在引进中吸收、改造、发展，在示范学习中运用和创新。建国本身建立的新社会形式就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未来的理想形式的追求，它所要达到的不仅是目前人类已获得的最好的文明成果，而且还预示着更加丰富、更加远大的社会未来。因此，借鉴、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并加以实践创新，方才适应这一社会形式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建构新时代的学校德育体系。

可见，建国是一种革命性的历史断代，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学校德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把握建国这一历史转折，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创建新时代学校德育的发展线索，审视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变革的经验教训，为今日学校德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研究建国以来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

当我们把建国看成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发展意义的革命性时代的开始，这赋予我们审视建国以来学校德育现代变革进程的一种不可多得的理性洞察力，也同样赋予这一研究以重大的时代意义。

（一）准确把握历史转折，揭示德育变革经验

如上所述，能否充分地把握建国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深刻内涵，是认识新中国学校德育本质的重要出发点。首先，把建国看成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有助于我们认识建国以来的学校德育与中国以往历史的德育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学

校德育变革的首要任务是要实现这一历史转折。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强的认识支点，建国以来学校德育的内在实质就在于向现代化转型，那么，研究它是否已实现了从旧德育到新德育的转变，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的跃进，实现了时代性的发展，就成了关系德育发展的重大课题。其次，把建国看成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想社会形式，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社会体制还只是部分先进分子认同的理想物，要使之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还需要动员全体国民，提高民众觉悟，在各个方面建筑起这一社会形式的坚实基础，其中德育的转型和发展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再次，把握建国这一历史转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审视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变革的经验教训，在历史的高度上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德育改革和发展实践做出适当的剖析和评价，借以提出当前学校德育发展的基本策略。

（二）研究历史转型特点，刻画德育现代变革的轨迹

建国以来中国学校德育的实践表明，由于未能从建国历史转型的角度把握中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变革，致使实践上出现了各种摇摆、偏差、失误和严重的挫折。应该看到，中国德育现代化是世界德育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服从世界现代学校德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又具有自身具体的运动形式，如民族性、时代性等。必须研究新中国学校德育如何才能在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独特的运动形式和发展阶段。实践证明，经济发达国家其德育的现代变革主要是在长期缓慢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依靠内在发展的积累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自发地产生创新行为，通过由下而上的道路实现其变革，达到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而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主要模仿先进国家的教育模式，凭借民族先进分子和国家力量，在短时间内，较快地建立起系统的现代教育制度，但在德育观念和道德整合上却很难实现跳跃性隔代发

展，必须依靠政府强力推行，开展由上而下的艰难的德育改革，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历史传承性断裂而致使德育改革前功尽弃。从历史上看，经济上变革的失败和流产所损失的是部分金钱，但可取得重要的改革经验。而德育上变革失败却会导致以整代人为代价的历史惨案并将殃及数代人的发展。美国、日本乃至亚太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大力推行现代化中，由于德育的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是发人深省的，中国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实践的教训更加深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研究建国以来的学校德育与世界德育现代化实践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学校德育实践的形式和特征，可以避免出现照搬发达国家德育经验和发展模式的“全盘西化”的倾向，也可以避免拒绝改革的民族自我中心论，避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正因为建国自身是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使建国以来学校德育的变革成了不可多得的教育实践，研究它对中国学校德育乃至世界德育都是有意义的。

（三）研究变革经验，寻找发展的基本策略

正由于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实践的特定性质，因而开展对这一时期学校德育实践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学校德育体系和推进中国德育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及发展策略。一是对中国德育的现代变革进行理论上的定位。近半个世纪来学校德育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发展着，从建国开始照搬苏联经验到十年建设时期的独立探索，尔后经历文革 10 年的混乱，再到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全面探索和变革。对建国以来 50 年的德育加以总结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当代学校德育的变革和发展状况，标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基本位置，对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校德育模式作一个较为清晰的勾画，尤其是对中国学校德育的目标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做出新的阐释二是标明中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变革的基本路向。建国以来的学校德育实践是相当曲折反复的，引发的教训也极为

深刻，对这些实践作系统的研究，加以理论化，将使我们从中获得对未来发展的昭示，勾画出学校德育实践基本路向。例如当我们把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60年代的学雷锋运动、批判母爱教育以及“文革”十年浩劫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改革，放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认识框架中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历史的传承和新旧德育之间的激烈冲撞，各种思潮、理论在传统的裹挟之下的转变，历史传承断裂的震荡甚至是旧道德沉渣泛起的嚣张，以及现代德育在幼稚的失误中走向成熟的进程。把握这一进程，明确其基本路向，就能抵御各种“左”或右的干扰，减少摇摆性，增强学校德育工作的自觉性。三是对中国学校德育现代变革的具体策略进行行动上的谋划。近50年来，中国的学校德育工作者在推行现代变革、创新新型德育体系方面进行了无数的尝试，有沿袭传统德育模式，有吸收西方常用的工作方法和基本原理，有继承老解放区创造的重要经验，还有参照苏联的德育模式等等。这些经验和具体策略，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政治氛围中加以运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研究总结这些经验，对之进行现代性的分析和加工，寻找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推行现代德育变革的具体策略和行动措施，使之成为创建中国现代学校德育体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而历史发展也充分显示，总结这50年来的实践经验，是寻找具体策略的关键一步，中国德育现代化不仅要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本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50年来中国德育现代变革的实践，将是中国德育理论工作者及德育实践家获得理性整合、认识升华、目标共识的关键性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目的，本书不避政治忌讳，不违知识浅陋，而对这一曲拆艰难的历史做一艰难的思想探索和情跋涉，希望能从中发现催生新德育的思想火花。

第二章

建国初期中国学校德育的创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全面变革和全新发展的时代。数千年来，教育主要是为剥削阶级服务，教育的权力被少数人所把持。新中国的建立从本质上改变了旧教育的性质，将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一转变，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章主要探讨自1949年10月至1956年以来新中国学校德育创建时期的有关实践与理论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取得了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本时期，新中国面临的是建立政权和维护政治稳定这一突出问题。党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剥夺官僚资本并将收归国有，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

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及时地对旧教育实行接收管理和改造，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并进行了课程、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使教育在配合建国初期各项工作并在为其服务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学校德育创建初期，它经历了 1949 到 1952 年重建学校德育阶段和 1952 年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前者注重在接管学校时对旧德育的批判重建，后者注重对学校德育的社会主义改造。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学校德育主要开展了五方面的工作：一是颁布了一系法令、方针、政策，并推行各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尤其是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学校都积极参与这些运动；二是在学校中推行老解放区优良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三是采取多种途径方法通过批判来改造旧学校德育；四是制定新的德育工作规章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五是全面学习苏联学校德育经验。通过开展上述的工作，从而逐步创建起新中国的学校德育体系。当然，这时期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也使这阶段的学校德育受到深刻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一、在继承、批判、改造基础上创建新德育

建国伊始，新中国在创新学校德育中，根据当时学校德育相对薄弱、传统德育根深蒂固的实际，采取了一系列稳妥可行的方

针和有力措施，较好地从前学校中争取了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创了建国初期德育的“开国贞观”的景象。其中，最重要的是较好地接管旧学校，吸收老解放区的经验，批判改造旧德育，开展重建新德育的工作。

（一）确定创建新中国学校德育的方针政策

创建新中国的学校德育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配合其社会发展并为其服务中实现的。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年轻的共和国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思想战线的任务异常繁重。国家在整治法纲、创建新秩序时，也同时颁布了有关发展学校德育的方针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根本法中就提出了学校德育的目标和任务：“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出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发表的《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的长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并把接管改造旧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清理教育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等列为五大重要措施，特别提出要工农及工农干部提供受教育的机会。1949年1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依据《共同纲领》的精神，提出对旧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原则。会议确定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教育的总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对当时接管学校的德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配合党在建国初期的任务，巩固和壮大新兴的人民政权，1950年，青年团中央召开第一次学校工

作会议，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指出：“学校思想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部也特发通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反帝教育、土改教育和“五爱”教育为三大重点。同年，《人民教育》连续发表徐特立《论国民道德》的长文，详尽论述学校“五爱”教育的重要意义。这些方针、政策、思想为批判改造旧德育，创建新德育指明了方向。

（二）接管旧学校、改造旧德育

建国初期，敌我斗争形势异常严峻，残存的阶级敌人疯狂叫嚣，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卷土重来，欲置新生人民政权于死地。当时人民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教育摊子，其成分大致有三：一是国民党政府办的“公立”学校；二是外国势力在中国设立的买办学校或教会学校，美帝国主义津贴学校就有 264 所（绝大部分是中学）；三是私人兴办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中相当部分是作坊式的乡间私塾，还存在不少以赢利赚钱为目的的“学店”。这些学校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着那样那样的联系，有些就是直接为反动政府服务的，其德育充斥着各种陈腐、不健康的甚至是反动的内容，向青少年灌输各种封建的思想观念和有害的意识形态。因此，接管这些学校，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工作。党和人民采取了分别对待、分阶段接管的方针，遵循先解决政治领导权再到学校领导权，再到教学权，再到德育改革；先大学后中小学；先城市后乡村等原则。由于德育上的根本对立，使当时学校德育的改造斗争显得格外激烈。在接管旧学校的同时党和各地政府对学校德育采取了慎重的改造举措：在制定一系列接管法规中做出创建新德育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全面取消以往的旧德育体系，删除相关科目及教学内容，取消“党义”、“公民”等课程，废除“军政训练”及训育科目，解散“童子军”组织等，宣布宣扬国民党反动思想为非法，其中心就是要

清除国民党学校德育的影响，建立新学校德育体系。

国民党学校德育，说到底，就是极力推行以反对共产党为宗旨，以法西斯主义为手段，以灌输封建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反动教育。国民党曾借“总理遗训”，颁令“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蒋介石更进一步说：“我们今后教育方针，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并特别注重中国的伦理哲学来研究我们的趋向。”据此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陶融儿童及青年”。为此他在学校中全面推行封建伦理道德的“四维八德”，把“四维”（礼义廉耻）为全国共同校训，以“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要求人人遵行。并据此作为学校德育内容，普设“党义”、“公民”等课程，系统宣讲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以此“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动。在中学还开设军训及训育科目，进行军政训练，其目的乃在于“锻炼学生心身，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军训的重点在于精神教育和绝对服从的训练。此外，在所有的学校中设立童子军。在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童子军总章》中，规定的誓词为：“誓遵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民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总之，就是要培养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人，学校的军训和童子军均由反共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所精制。另外，国民党还在中学和大学建立各种反动组织，如大力发展“三青团”，发展复兴社成员或下属组织，强迫教师学生参加国民党组织；大力推行反共、反赤化宣传教育，对中学以上学生进行严格政治教养训练，新生入学要举行宣誓效忠仪式，誓词为：“余以至诚爱我中华民国，

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并遵守校规，努力求学，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处分，谨誓。”国民党特务还在学校中公然活动，迫害进步青年，制造白色恐怖。所以，在旧学校中，国民党出于反共需要和剥削阶级的本性，早已建立了一套从目的、内容、体制到措施等方面都非常完整的德育体系，对学校生活和各科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毒害很深。因此，解放后面对接管旧学校的艰巨任务，最为棘手的不是撤换反动的学校校长和清除反动分子，而是转变人的观念，建立新中国的学校德育体系。所以，人民政府在接管教育之初，就非常重视对学校德育的改造和重建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1）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把接管教育和重建学校德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反复强调和确定新德育的方针和基本内涵。这点在前面已有论述。（2）坚决打击特务分子和反动政客，清理学校管理阶层中的不法分子，并先后展开肃反运动，基本上清理了隐藏下来的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3）整顿德育秩序，废除旧的反动德育课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是重新明确德育在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指出旧德育的危害和积极倡导新学校德育；二是废除“党义”公民课和政治训育等宣传反动政治观点的科目，停止军训课程，取消反动的宣誓活动；三是取缔“三青团”等反动组织，解散“童子军”等旧的学生团体和德育组织，断绝与国外帝国主义的有关机构的联系；四是对旧德育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肃清国民党散布的各种谬论，教育师生明政策、辨是非，大力倡导新德育、新观念，在学校中举办了各种展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利用土改和肃反成果，揭示反动派面目和旧德育的反动性质，提高师生思想觉悟。

在清理旧德育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大力抓紧德育的创建工作。

（1）派大批革命干部和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分别担任学校的领

领导人，强化党对学校的领导。（2）明确党的教育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繁荣富强服务。在 1949 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又先后召开了高等教育、工农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民族教育等方面的首次会议，这些会议不仅具体制定了各级各类教育的任务，而且强调要贯彻教育为国家服务，为工农服务的方针，特别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学校师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国家建设人才。（3）大力倡导新中国的新思想、新风尚，宣传“五爱教育”，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设计新的政治教育课程。1949 年 10 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大学专科学校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分别规定各年级必修“新民主主义”等课程。1951 年，教育部颁布条规，规定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分别设置“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本知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时事政策”等课程，并要求各教育部门要把政治教育作为必修业务课，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学。1952 年后，基本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德育和政治课程体系，高校各年级也逐步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伦理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可见，政治课教育已从接管初期的启蒙教育转向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4）建立系统的德育工作机构和工作体系。建国后，我们党在接管学校取缔各种不良德育机构的同时，着手建立学校德育的有关机构。1949 年 10 月，中国青年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并通过《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草案》，推动全国小学大力建立少年儿童队的工作，借以团结、教育广大少年儿童。1950 年，人民政府确认每年六月一日为“儿童节”，举行各种庆典活动和教育活动。1951 年 11 月，教育部颁发了《各级学校升降国旗办法》，随后各级学校开展了升降旗仪式的